

P

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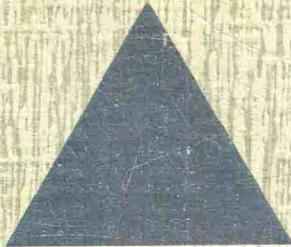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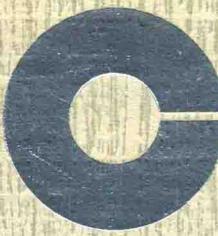
# 普鲁塔克全集

I

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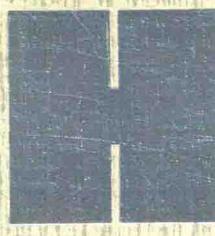


R



[古希腊] 普鲁塔克 著  
席代岳 译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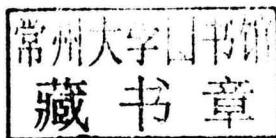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PLUTARCH

[古希腊] 普鲁塔克 著  
席代岳 译

普鲁塔克全集 ①



## 编者前言

普鲁塔克，罗马帝国盛世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散文家、道德学家之一，罗马帝国两位盛世贤君哈德良皇帝和图拉真皇帝的老师，其“哲学王”的治国理想，缔造了雄视古今的罗马帝国的黄金盛世。

《普鲁塔克全集》涵盖普鲁塔克最重要的两部著作——《希腊罗马名人传》、《道德论丛》，前者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和希罗多德的《历史》并称西方古典史学著作的“双璧”，堪与司马迁的《史记》相媲美。后者是普鲁塔克一生讲学要义的精粹，更能体现普鲁塔克作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散文家的哲学主张。

《普鲁塔克全集》版本复杂，涉及希腊文和拉丁文相关文献之浩繁，用汗牛充栋形容不为过。整理翻译乃至出版其中文版可谓一件艰苦而吃力的工程，幸而有“洛布古典文库”这样严谨的版本之帮助，此事乃成其竣。席代岳先生的翻译工作用了6年半、编者和校订的学者花费了2年多，前后共历10个春秋。编者每展文笺，唯见字字心血熬就。值此付梓之际，编者感念和欢喜之心各半。尤其要感谢席代岳先生和参与编辑过程的学者们，有了诸君的努力，读者一睹为快的夙愿才得以实现。当然，幸逢盛世与和平的年代，也是这部人类文明伟大作品中文版得以出版的根本。

编者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编辑过程中，采取尊重译者语言习惯和行文风格的原则，故而部分通行译名保留了中国台湾地区的惯例。本书注文均采用了洛布古典文本的原注，译者和中文版的新注会特别标出。另外，我们延请专家对译文做了审读，进行了细微的修正，但因编者水平有限，作品肯定存在瑕疵，望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及时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 译者简介

席代岳，1939年生，祖籍湖南省东安县，10岁随父母去台湾地区。陆军官校1963年班炮科，军中历练各种指挥职与幕僚职，曾在三军大学任教，1999年以陆军中将退役，之后从事文字工作，译作有《凯撒战记》（麦田出版社，200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简体字版）、《鏖斗的年代：1941—1975的美越关系》（麦田出版社，2002）、《战争的罪行》（麦田出版社，2002）、《罗马帝国衰亡史》六卷全译本（联经出版公司，2006；吉林出版集团，2008，简体字版）、《希腊罗马名人传》三卷全译本（联经出版公司，2009；吉林出版集团，2009，简体字版）及《道德论丛》四卷全译本（联经出版公司，2014；吉林出版集团，2015，简体字版）等。

# 《希腊罗马名人传》译序

## 一、前言

译者在半个世纪以前的青少年时代，曾经读过朱生豪所译莎士比亚的《恺撒大帝》，第三幕第二场布鲁图斯在弑杀恺撒以后，向罗马市民发表演说：“我这样做，不是爱恺撒爱得少，而是爱罗马爱得多。”(This is my answer; Not that I loved Caesar less, but that I loved Rome more.)仁人志士为了推翻暴政，不惜牺牲敬仰的恩主，这种“大义灭亲”的举动对译者产生很大的影响。后来得知汤玛士·诺斯(Thomas North)在1579年将希腊文《希腊罗马名人传》经由法文译本转译成英文，莎士比亚根据这部书提供的史实，写成与罗马有关的三部剧本，从当时起就想一窥这部伟大的著作。

西方世界的文明渊源于古代的希腊罗马，国人对那段发展的过程认识不深，即使是中学的历史课本和从电影电视中看到的情节，知道的人物不过是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恺撒(Caesar)和庞培(Pompey)，朗朗上口的名字也以哲学家如柏拉图(Plato)、苏格拉底(Socrates)、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文学家如荷马(Homer)、西塞罗(Cicero)，科学家如欧几里德(Euclid)、阿基米德(Archimedes)等为限。如果能有这样一部传记来介绍那个时代的人物，让读者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进而明了有关的政治、军事、经济、种族和宗教，不仅获得阅读的乐趣，也可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等到译者军校毕业进入军队服务，在1964年左右，看到“国立”师范大学英文系吴奚真教授为“国立”编译馆所译《希腊罗马名人传》，只选择九篇传记，不过是全部的五分之一，已经是如获至宝。虽然四十多年的时光转瞬已过，直到今日仍旧对吴教授的译文心折不已，更是给个人带来完成这部书的驱策力量。

## 二、普鲁塔克的平生和著述

卢契乌斯·密斯特流斯·普鲁塔克斯(Lucius Mestrius Plutarchus)是希腊人，从英译本获得普鲁塔克(Plutarch)这个常用的称呼。他出生在皮奥夏(Boeotia)的小镇奇罗尼亞(Chaeronea)；皮奥夏位于希腊的中部，正好夹在阿提卡(Attica)和福西斯(Phocis)之间，他曾经提到这里的居民懦弱怕事，认为皮奥夏人的奴性很重，因为地区多山，民风非常闭塞。他在第二十篇的《德摩斯梯尼》中特别说起：

优里庇德(Euripides)认为一个人最大的福分，在于他的出生地是“著名的城市”，我的看法是“子不嫌母丑”，谈起人生真正的幸福，主要在于他的气质和习性，这与故国的卑小和无籍藉名没有多大关系。追逐名利的行业在贫穷和没落的市镇，会逐渐萎缩和式微，说起德行则不然，可以在任何地点生根茁壮，获得智慧的养分和培育豁达的心灵。

很多作者提到普鲁塔克出生的年份，都有不同的说法，大约是克劳狄斯(Claudius)皇帝在位的中期到末期，即45 A. D.—50 A. D.之间。这个时间可以推算出来，尼禄(Nero)66 A. D.访问希腊，他正在雅典师事阿蒙纽斯(Ammonius)，一般来说，希腊人接受教育的时间，都是在15—20岁的青少年时代。

他的家庭在皮奥夏是富有的乡绅，《掌故清谈录》(Moralia)中记载他的祖先在古老的奇罗尼亞，一直居于最显赫的职位。他的曾祖父尼查克斯(Nicharchus)时常向他们讲述一件往事，安东尼和屋大维争夺天下，所有的城市被迫交出定额的谷物，市民要背到安蒂赛拉(Anticyra)的海滨，士兵用鞭子在旁抽打，好让他们的动作快一点，这时正好安东尼战败的消息传来，征粮官和手下赶快逃走，他就把留下的谷物分给大家。

普鲁塔克提到他的祖父兰普瑞阿斯(Lamprias)，说他极其健谈而且想像力非常丰富，在《安东尼》这篇传记中，记载他与御医交往的见闻。他的长处在于与人为善，是一位可靠的同伴和朋友，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幸福的老好人，当他们向巴克斯(Bacchus)献祭的时候，只有他能得到麦邱利(Mercury)的厚爱；平素

喜欢饮酒，经常在宴席中笑语如珠，成为最受欢迎的人物。

普鲁塔克推崇他的父亲，一直对他怀念不已长存在记忆之中，只是从来没有在作品中把他的名字写出来。他说他的父亲是敦品励学的君子，对于那个时代的哲学和神学都有相当的造诣，熟悉当代诗人的作品。普鲁塔克在他的政治理学教材中，拿他父亲的审慎作为例子，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道：“我记得我还年轻的时候，奉派与另一位奇罗尼亞的市民担任使者去见行省的总督。我的同事发生意外，不得不在途中停了下来，我还是继续前进去完成交付的任务。等我回到奇罗尼亞，要向市民大会提出协商的报告，我的父亲将我叫到一边，特别交代我不要光提自己，还要顾及我的同事，所以千万不要只说：‘我’见到那些人；‘我’讲了那些话；‘我’做了那些事；而是要说：‘我们’见到那些人，‘我们’讲了那些话；‘我们’做了那些事。特别让我知道，要避免高傲和侮慢的行为，才不会引起别人的嫉妒和陷害。”

泰蒙(Timon)和兰普瑞阿斯是他的两个兄弟，从小在一起读书和游戏，他经常带着愉悦和友爱的口吻谈起相处的往事。特别在提到泰蒙的时候说道：“命运女神对我何其厚爱，让我比别人拥有更大的幸福，唯有泰蒙对我那种无私无我的手足之情，让我一辈子都无法报答。”兰普瑞阿斯不仅继承祖父的名字，就连那种开朗和幽默的性格都极其相似。

普鲁塔克虽然在小城过着平静的生活，还是会遭到灾难和不幸，他的妻子泰摩克森娜(Timoxena)生了五个子女，四个男孩和一个女儿，这个女儿与他的妻子同名，他曾经写道：“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就恳求她的奶妈，在喂其他婴儿的时候，也要让她的玩偶有奶吃。”这个女儿和另外两个儿子未成年就夭折。很多学者认为他对女儿的死亡，抱着一种听天由命的心情，在他一篇用书信体写成的随笔——《安慰他的妻子》中，说他的哀伤是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

普鲁塔克在雅典求学，老师是知名的柏拉图学派哲学家阿蒙纽斯，对于他的一生产生重大的影响，他在作品中经常提到这位导师的名字，有次还说雅典有位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是他最亲密的知交好友，与他一起在阿蒙纽斯的学院里面孜孜不倦的攻读。后来有位拜占庭的历史学家优纳庇斯(Eunapius)，特别提到“阿蒙纽斯是埃及人，他是普鲁塔克的神学教师”。可能是普鲁塔克写出的掌故和传闻，包括很多埃及的宗教信仰，所以大家认为他在亚历山卓有长时期的学习过程。

当他停留意大利期间，曾经访问罗马并且住在那里，从《德摩斯梯尼》中让我们知道一点情形，公务繁忙之余还要教授哲学，跟随的学生人数还不少，所以没有空闲的时间学习罗马的语言。他很可能游历很多地方，所以在《马留》这篇传记的开始，就说他到过拉芬纳(Ravenna)看见马留(Marius)的大理石雕像，面容表现出大家所熟悉那种严厉和刚毅的神色。

就那个时代而言，普鲁塔克拥有宽阔的眼界和胸怀，他在年轻时代曾经到埃及游历，使他受益匪浅，同时他到过希腊各地和小亚细亚，接触到很多的事物，他因公务来到意大利，后来又在希腊讲学，接着在罗马逗留相当时间，这在一个历史学家而言，是最宝贵的岁月，可以搜集很多他所需要的书籍和资料，然后回到奇罗尼亚写作《希腊罗马名人传》。他说：“我始终住在一个小镇，希望继续留在那里，如果连我都搬走，岂不是显得它更为微不足道。”他从来没有自抬身份觉得高人一等，为桑梓的服务包括下水道和建筑的工作。他特别提到：

奇罗尼亚的市民用微笑的面容，注视我所从事的职责。有时，在我心中会浮起犬儒学派哲学大师安蒂塞尼斯(Antisthenes)的身影：当他从市场回家的时候，手里提着一条很脏的鱼，大家看了很惊奇， he说道：“我买这条鱼是自己要吃。”至于我的做法与他大相径庭，我之所以会去测量屋瓦和计算石材和泥灰的价格，这不是为了自己盖房子，而是为了公家的需要。任何服务都要放下身段，不计毁誉，才会收到更大的成效。

普鲁塔克出任行政官员，主要的工作是要调解私人的怨恨，尽量做到便民的要求，任何案件都要主持公道，他的家庭是善门常开，让受到委屈的人在他这里找到庇护之所。他终生负起德尔斐(Delphi)祭司的职责，也是雅典的荣誉市民，在他垂老之年，哈德良(Hadrian)皇帝授予他希腊行政长官的官位。有人说他寿至耄耋，但是对于他去世的年代，还是不得而知，很可能是哈德良皇帝在位的初期，大约是119A.D.—127A.D.之间。他在身后还有两个儿子，名字是普鲁塔克和兰普瑞阿斯，后者是一位哲学家，曾经为他的作品编了一个目录，让后人看到以后如同德莱顿所说，出现那种商人在损失船只以后细读运货清单的心情。

普鲁塔克不仅是一位传记文学家、散文家、专栏作家和柏拉图学派的知识分子，还是一位折衷派的哲学家，他的思想体系来自不同的渊源，他从柏拉图的学

院派打下哲学思维的理论基础，从亚里斯多德的逍遥学派习得逻辑和自然科学，从斯多噶学派坚持立身处世的原则，从伊壁鸠鲁学派建立合理的生活方式，从毕达格拉斯学派养成与人为善的态度，这些不同的门派所秉持的主张，在他的《掌故清谈录》中，可以得到合乎理性的解释。

不仅如此，在后人的眼中他是一个道德论者，本书可以说是“伦理学”的历史观教科书，所以大家特别推崇他那悲天悯人的性格和慈善为怀的情操。书中描述不计其数的战争场面，列阵的战士敲击盾牌，刀剑发出夺目的寒光，进攻的脚步配合着呐喊的声音，两军直杀得烟尘遮日，血流成河，是何等的悲愤和惨烈。然而伟大的著作仍旧闪耀着人性的柔情，在那个奴隶社会的时代更是极其难能可贵，特别在提到老加图(Cato the Elder)时说他：“买奴隶的条件不在于温柔的个性和英俊的面貌，而是身强力壮的工匠、马夫和牧人，等到这些奴隶在年老力衰以后，就应该将他们卖掉，家里不会白养那些吃闲饭的人员。”于是普鲁塔克大肆抨击，批评老加图的性格过于严苛不近人情，认为人与人的关系不仅在于有利可图而已。他还要将这种民胞物与的精神推及到动物的身上，不能将它们看成鞋靴或碗盘，等到老旧残破不堪使用，就像垃圾一样抛弃，特别在《伯里克利》和《地米斯托克利》中对于爱护动物有极其生动的叙述，说是我们只要学着对人类永怀慈悲之念，那么对其他的动物也会有恻隐之心。

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出普鲁塔克的政治理念，只有共和国的民主政体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制度，对于世袭的继承和君王的专制抱着杯葛的态度，特别是寡头政体所出现的僭主，更是深痛恶绝亟需扑灭的对象。他认为要维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必须运用选贤与能的方式，推举有治国才华和具备道德勇气的人士，组成元老院和政府。所以他对于莱克格斯(Lycurgus)、努马(Numa)、伯里克利(Pericles)和索伦(Solon)等伟大的立法者和政治家，带着钦佩的神情给予最高的评价；相对之下，即使是亚历山大(Alexander)、恺撒(Caesar)、亚杰西劳斯(Agesilaus)和苏拉(Sylla)的霸业，旋起旋灭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普鲁塔克是那个时代最知名的学者和作家，虽然罗马帝国的声威已达到万方臣服的巅峰，拉丁语文占有最强势的地位，然而他还是用希腊文写作，特别提到他虽然在意大利住过相当时日，但没有闲暇学习罗马的语言，直到垂暮之年才阅读拉丁文的书籍。这种状况在当时非常普遍，因为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爱好是一种风尚，精通希腊语文是身为上流社会必备的条件，甚至比我们现在学英文更具

有一种强烈的炫耀心态。本书为了迎合罗马人，将很多希腊神话人物的名称改为罗马人常用的名字，譬如将奥林匹克主神宙斯(Zeus)称为朱庇特(Jupiter)、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娜(Athena)称为密涅瓦(Minerva)、天后赫拉(Hera)称为朱诺(Juno)、月神阿特米斯(Artemis)称为戴安娜(Diana)等，有的地方很不习惯，让人感到比较庸俗。

经过两千年的岁月，普鲁塔克传世的作品只有两部：一部就是《希腊罗马名人传》，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是按性质相同的英雄人物，各以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传记并列，后面接着是一篇比较式的评述。现存的传记包括22个单元有46篇，其中还遗失4篇评述，此外还有4篇独立性的帝王本纪。这些传记涵盖的时期从800B.C.到69A.D.，大约有9个世纪，按照地域的区分是意大利25人、希腊24人及波斯1人共计50人。另外一部是《掌故清谈录》，这是内容非常复杂的大部头著作，包括传闻轶事、文学艺术、教育概要、宗教信仰、古代文物、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等共83篇随笔，研究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人文、经济、社会、生活和宗教，这部书提供第一手的资料；洛布文库有法兰克·贝比特(Frank C. Babbit)的译本，是希腊/英文双语精装本共15册。

他的次子兰普瑞阿斯是一位哲学家，曾经为他父亲所有的作品编成一份目录，要是与现存的著作比较，发现遗失的数量极其庞大，主要的项目可以区分为四类：一是克拉底(Crates)和戴芳都斯(Daiphantus)的传记和评述、伊巴明诺达斯(Epaminondas)和老西庇阿(Scipio the Elder)的传记和评述。二是海格力斯(Hercules)、赫西俄德(Hesiod)、品达(Pindar)、李奥尼达斯(Leonidas)、亚里斯托米尼斯(Aristomenes)、奥古斯都(Augustus)、提比略(Tiberius)、克劳狄斯(Claudius)、尼禄(Nero)、喀利古拉(Caligula)、维提留斯(Vitellius)等人的传记，后面这六位罗马皇帝可以列入“帝王本纪”。三是《荷马评论》(Commentaries on Homer)4卷、《赫西俄德评论》(Commentaries on Hesiod)4卷。四是随笔5卷、神话3卷、修辞学3卷、心灵修养3卷、哲学家的摘要2卷、论感觉3卷、城市的论题3卷、政治学2卷、论被遗忘的历史4卷、《亚里斯多德论述》8卷、诗论，及其他论文和小册子。

普鲁塔克著作对于英国和法国的文学和戏剧，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莎士比亚有三部剧本，像是《朱理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科瑞欧拉努斯》(Coriolanus)和《安东尼和克丽奥佩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取材于汤玛

士·诺斯(Thomas North)爵士在 1579 年所译《希腊罗马名人传》，从此以后数百年间，英国对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和考古，一直执西方世界的牛耳；就是文物和艺术品收藏的丰富，也是其他国家所望尘莫及。英国 17、18 世纪的哲学家、文学家和传记家，像是詹姆士·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班·琼森(Ben Jonson)、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法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等人，认为在古代的作家中，普鲁塔克的作品最能深入人心，对建立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做出极大的贡献，其中卡顿·马瑟(Cotton Mather)和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更是极力加以模仿。詹姆士·鲍斯韦尔在《约翰森传》(*Life of Samuel Johnson*)的序文中，详细介绍他运用普鲁塔克的写作风格。

美国文学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一些先验论者，受到《掌故清谈录》很大的启发。爱默生将《希腊罗马名人传》称为“英雄的圣经”；法国文学家蒙田(Montaigne)的名著《随笔集》，曾经有四百多处引用普鲁塔克和他的作品，特别是《掌故清谈录》更是主要的来源。普鲁塔克的影响力到 19 和 20 世纪开始式微，提到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只要读起这本书仍旧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普鲁塔克的作品已经译成各种文字，其中法国人杰克·亚缪(Jacques Amyot)曾经前往梵蒂冈从事研究工作，分别在 1559 年和 1572 年将《希腊罗马名人传》和《掌故清谈录》译成法文，最早将这两部名著引进西方世界。特别在英国产生巨大的回响的是，汤玛士·诺斯在 1579 年根据法文译本转译为英文。1683 年英国桂冠诗人约翰·德莱顿为普鲁塔克写出一本传记，开始依照希腊原文译出本书，到了 19 世纪经过古典学者亚瑟·胡格·克洛(Arthur Hugh Clough)的修饰和订正，文字隽永，情节动人，描写的英雄豪杰栩栩如生，掌握历史的脉动和文化的精髓，令人神往于奔腾澎湃的才华，心折于简朴雄伟的体裁。1901 年美国古典学者伯纳多特·佩林(Bernadotte Perrin)再出一个英译本，列入洛布(Leob)文库，他的风格大相径庭，言简意赅，过于平铺直叙，气势不足。此外还有拉丁文、德文、俄文等各种译本。

普鲁塔克身后享有很大的名声，像是 2 世纪的意大利文学家奥卢斯·杰留斯(Aulus Gellius)赞誉他学术方面有极大的成就；3 世纪的埃及哲学家阿昔尼乌斯(Athenaeus)在他的《知识的盛宴》中，推崇普鲁塔克是充满光辉的哲者；4 世纪的克劳狄斯·克劳迪阿努斯(Claudius Claudianus)认为他足当学富五车、才高

八斗之名；4世纪的天主教主教和神学家优西庇乌斯(Eusebius)为希腊哲学家所写的传记，把普鲁塔克列名首位；14世纪的意大利桂冠诗人佩脱拉克，在他的作品中将这位传记家用上“伟大的普鲁塔克”这样的头衔。还有不计其数的文人学者表达景仰之情，所以他的墓志铭用下面这首诗来表达他在历史和文学的地位：

希腊罗马多英魂，  
丰功伟业起雄风；  
太史志业唯著述，  
千秋万世掌玉衡。

### 三、褐藻传记的原则和规范

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对后世带来的影响，不仅是它的内容发千古未有之奇，更重要的是对于写出这本书的动机、目的、方式、风格、功能和创意，都有详尽的说明和阐释，使得西方世界的史学界对于传记的写作，一直到18世纪，都完全遵循他的原则和规范，来为知名之士著书立传，俾能达到留芳后世的要求。普鲁塔克在第一篇《帖修斯》中开宗明义的提到：

我生长在这块人烟辐辏的土地，能够站在人类历史的立足点，掌握真正可以接触到的资料，要对希腊和罗马的英雄豪杰，就他们的平生加以记载和评述。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说明：“我要不这样努力去做，那么以后除了传奇和神话，其余的史实都无法留存下来。每个市民都以大诗人和寓言家自居，他们的叙述完全不值得采信，都是一些无中生有的传闻。”让我们怀抱希望，相信“传说”带有纯粹史籍的特质，顺从“理性”的净化程序，并且认为这是它应该遵循的路线。不过，在任何情况之下，只要能够发现有一点可信性存在，就不应将所有的事物全部视为可疑。我们只能乞求读者网开一面，对于古老的故事抱着宽容的态度。

这位传记家的写作正是聂尔瓦(Nerva)、图拉真(Trajan)和哈德良(Hadrian)

三位皇帝在位这三十余年之间，帝国一片繁荣和平的景象，罗马的法律和希腊的哲学已经到达巅峰时期，与他同时代的主要学者和作家，像是历史学家和军事家色克都斯·朱理乌斯·弗隆蒂努斯(Sextus Julius Frontinus, 40A. D. — 104A. D. )、犹太学者和历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法斯(Flavius Josephus, 37A. D. — 100A. D. )、诗人马可斯·华勒流斯·马蒂阿利斯(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 38A. D. — 100A. D. )、修辞学家和演说家笛奥·克里索斯托穆斯(Dio Chrysostomus, 40A. D. — 120A. D. )、历史学家巴布流斯·高乃留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55A. D. — 120A. D. )、政治家和学者小普里尼(Pliny the Younger, 61A. D. — 114A. D. )、讽刺诗人狄西穆斯·朱维纳利斯(Decimus Juvenalis, 60A. D. — 140A. D. )即朱维诺(Juvenal)、历史学家该犹斯·苏脱纽斯(Gaius Suetonius, 69A. D. — 150A. D. )等人，有丰富的著作，都能领一时的风骚，使得他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他不像这些人都住在罗马，运用当时拥有优势的拉丁文，他是一个居住在乡间的希腊士绅，掌握古老的希腊文来写作：即使如此，普鲁塔克还是博得极其响亮的名声，成为帝国誉满士林的人物。

罗马有如东升的旭日，对比之下的希腊已陷入悲惨的处境，经过三次马其顿战争以后，所有的城邦完全丧失自由权利和政治独立，成为新兴帝国的臣属和行省，往昔的创造性才华和积极性精神，全部在腐化和颓丧中消失殆尽。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庞大帝国，在他逝世不过144年的时光，全部化为乌有，现在所有人类在罗马一个城市的支配之下。等到普鲁塔克诞生之际，希腊世界沦为卑屈和受征服的土地，人口剧减，商业和农业与日萧条，人民贫穷而绝望。再就文化的传承而言，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季诺和伊壁鸠鲁望重士林，执文坛的牛耳，他们创建的学派被门人子弟全盘接受，逐代流传，后人的心智被局限在前人的窠臼之内，诗人和辩士的华丽词藻，无法激起熊熊的烈火，只被人们不带丝毫感情的抄袭模仿，要是有人敢于打破成见自立门户，就会被人视为背离法统和正道。普鲁塔克身为希腊民族最优秀的分子，自幼接受哲学的薰陶，唯恐希腊昔日的光辉在衰亡过程之中，成为明日黄花。他相信一个伟大民族经历考验，必然留下令后人景仰不已的丰功伟业，古代英雄豪杰的勇气、智慧、刚毅和仁慈所留下事迹，不能让它就此湮灭无踪，基于这个动机才有这部书的写作。

普鲁塔克特别强调历史和传记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可以印证今天的书籍分类，在“传记”这个项目下面的各种回忆录、自传、个人历史和口述历史的风

行一时，其来有自。普鲁塔克在第十七篇《亚历山大》中有以下的说法：

亚历山大和恺撒这两位显赫的人物可供颂扬的伟大事迹实在无法胜数，只能将他们一生当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传闻轶事概约加以描绘，无法对每一项傲世惊人的丰功伟业都作详细的记载。大家应该记得我是在撰写传记而非历史。我们从那些最为冠冕堂皇的事功之中，并不一定能够极其清晰看出人们的美德或恶行，有时候一件微不足道的琐事，仅是一种表情或一句笑谈，比起最著名的围攻、最伟大的军备和最惨烈的战争，使我们更能深入了解一个人的风格和习性。如同一位人像画家进行细部的绘制，特别要捕捉最能表现性格的面容和眼神，对于身体其他的部位无须刻意讲求。因之要请各位容许我就人们在心理的迹象和灵魂的征兆方面多予着墨，用来追忆他们的平生，把光荣的政绩和彪炳的战功留给其他作家去撰写。

英国史学家雪尼·李(Sidney Lee)在《传记原理》一书中，认为：“传记之兴是餍足人类纪念的本能。”“纪念”就是怀旧或思古，人情乐于怀旧，亦喜思古，所以关于古人的行谊事略，很自然发生兴趣。从普鲁塔克强调的重点来看，他所说的“传记”已经脱离“史学”的范围而进入“文学”的领域。这个时候他的写作必须符合三个要求：第一是传记要能将“传主”和相关的人物，重新创造出来，无论从任何角度去观察，都能表现出真实的面貌。第二是传记必须讲出可以吸引人的故事。第三是作者对人物的描绘和情节的交代，要有某种意境或韵味，使读者从类似的生活经验中引起共鸣。

提到的三个要求，就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让古代的生活能在21世纪引起共鸣，根本难以想像。事实则不然，译者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第七篇《伊米留斯·包拉斯》有这样一段记载：“伊米留斯与他的妻子帕皮里娅离婚，受到朋友的责备，大家争相说道：‘难道她不贞节？难道她不漂亮？难道她不生育？’这时伊米留斯把脚上穿的鞋子拿起来让大家看，然后问道：‘难道这双鞋子不是新的？我穿起来难道不好看？然而，谁知道这双鞋会夹我的脚。’确实如此，有些情节重大或众所周知的缺失，反而不会造成双方的决裂，倒是一些细微的琐事，不断产生的烦恼，特别是个性的冲突所引起的厌恶之感，带来的疏远和反目，使得两人都无法容忍，以致夫妻不能再生活在一起。”从这个故事来看，我

们的心理状况和情绪反应与古人又有什么差别？难道他的话不会使我们深有所感？

普鲁塔克虽然已经说明传记与历史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他所写的传记就是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将两个古老的文明中最重要的环结连接起来。要是与我国的史书架构作比较，它就是一种纪传体的正史，所谓“纪传体”就是表达的方式和内容以传记为主体，只不过身为皇帝或曾经统治过天下的人，他们的传记叫做“本纪”；诸如《史记》的《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诸侯或是统治过某一地区的人，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诸如《史记》的《越王勾践世家》、《孔子世家》。一般贤臣名将或异行著称者，他们的传记叫做“列传”，诸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刺客列传》。个人认为本书是一部历史典籍，就范围和深度来说虽然不及《史记》，就目的、功能和运用的著述方式而论，看来是无分轩轾。

普鲁塔克非常感慨地提到，史书的著述要保持客观的立场是何等的困难，特别是那个时代，要想不表达自己的好恶爱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即使是诸如塔西佗这样伟大的史家，还是会引起后人的诟病。他在第五篇的《伯里克利》中提到：

历史的著作要想每一件事物都能辨明真伪是非常困难的工作，一方面是因为后世的史家被漫长的时间遮断他们的目光，另一方面是有关行谊和事迹的当代记载，出于嫉妒或恶意或是包庇和奉承，总是扭曲事实的真相。

列传中比较特殊的角色是传奇人物，虽然历史上确有其人，如雅典和罗马的创建者帖修斯和罗慕拉斯，平生的事迹全由神话和传奇编织而成，罗马的波普利柯拉和科瑞欧拉努斯的传记，同样充满罗曼史的色彩，这些都是吟游诗人口耳相传遗留下来，禁不起考证和检验，所以普鲁塔克才会请求读者抱着宽容的态度。

希腊人和罗马人都将历史看成文艺的一个分支，所以他们的著述不在于历史的观点和法则，完全采用文学的表达方式或戏剧的表演手法，甚至像是西塞罗这样的大学者，将历史纳入修辞学的范畴，他曾经明确指陈：“修辞学家有权校订和改变历史的事实，进而达成更佳的叙述效果。”即使像是李维(Livy)和塔西佗这些史家，并不认为要忠于史实作客观的描绘，第一手或目击的资料在他们而言可有可无，文学表达的成效较之内容的正确与否更为重要。

其次要谈到传记有关纪年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普鲁塔克这本著作，最大的缺失在于没有明确指出事件发生的年代。就这一点而论，比起《史记》大有不如，中国自武王九年(1064B.C.)已有纪年出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始于841B.C.，有准确的年代记事。

如果不从宗教信仰的立场来看《新约》的四福音，可以说是最佳传记的范本，如同《论语》一样忠实记录耶稣的言行，而且具备着简洁、坦率、翔实和生动的特色。所以我们可以第七篇的《泰摩利昂》中，看到普鲁塔克有这样的表示：

德谟克瑞都斯(Democritus)要我们经常祈祷，希望名人的幽灵能在我们的四周出现，这种做法对我们来说是出于善意，让我们自然而然认同他们的美德，不要刻意去强调他们的恶行和带来的灾难。然而这种做法过于装模作样，等于打着哲学理论作为幌子，只能引领我们从事没完没了的迷信行为。我的方法与他完全相反，重点在于历史的研究，要求精通写作的方法，训练自己记忆的过程，把古往今来伟大人物的形象深印在脑海之中。即使我出于工作的需要，不得不经常接触那些有关的史实，还是要尽力避免描述下流、无耻和可憎的事迹，不要感受容易传染的恶习和劣行。最好的办法是掌握思考的对象，保持平常心和责任感，拿高贵的人物作为叙述的模范和榜样。

普鲁塔克是写这样一本书最适合的人物，他的家世和出身使他能够接受最好的教育，从而对希腊文化具备渊博的知识，曾经游历当时罗马帝国很多地区，拥有开阔的心胸和独到的眼光，交游广泛加上个人的地位，可以搜集各种书籍和资料，尤其是他在故乡担任的职务和祭司的工作，使他拥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光。

我们在读完本书以后，常会有这样的体认，普鲁塔克是一个卫道之士而非一个历史学家，他的兴趣不在于政治和帝国的变迁，要点在于传主的人格特质、个人的言行表现和动机；德操的奖励和恶行的惩治；尘世的是非功过以及冥冥之中主宰的力量。他的传记着重于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和柏拉图的哲学，所形成的宗教观用来教育当时的人民。

他始终认为即使一个暴君，也会具备德操、高贵、英勇和慷慨的特性；然而他并没有塑造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典型楷模。在他而言，世间没有完美的人。他

对道德的要求可以说是永无止境，汉弥尔顿有这样的表示，说是普鲁塔克笔下的人物，使人很容易相信他们具备伟大的气质。当然在列传的众多传主当中，很多人犯下十恶不赦的罪行，普鲁塔克的宽容和包庇，难免会引起有识之士的责难。

一般而论，传记家不该受死板的法则和教条所约束，要能够随心所欲选择自己的表达方式，这才可以适应特定的题材和读者。普鲁塔克在第十三篇《西蒙》提出他对使用文字叙述的看法：

我认为用文字描述传主的风格和习性，比起用雕塑表现他的容貌和体态，可以让他获得更大的荣耀，就像画家正在描绘一张美丽的面孔，虽然还有一些不够完美的地方，无须完全忽略不理，也不应该刻意突出，因为后者会使画像变得丑陋，前者损害到本人和画像的相似之处。拿我们现在的工作来说，要是一个人的生平都找不到任何瑕疵，这是极其困难且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只能就表现卓越和优异之处据实以报，要能充分的表达不可故意疏忽。只要是出于人类的热情或政治的需要，发生任何过错和缺失，我们宁可认为这是特定德行的美中不足，而不是邪恶行为的必然后果。如果这种恻隐之心出于软弱的天性，不可能成功的造就人类的特质，在德行方面达到如此完美的境界，那就是能从混杂错乱之中出现纯真，开阔的心胸不会任意的责难，因此我们抱着爱管闲事的态度，不将这些负面的报道写进传记里面。

普鲁塔克被人称为“英雄人物的崇拜者”。他在本书中所选择的传主，以君王、将帅、权贵和辩士为主，对于文学、哲学和艺术领域的名人学者，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他认为就历史的价值和不朽的名声而言，无法与建立事功的英雄豪杰媲美，他选择的罗马人绝大多数是罗马帝国创建前后不及百年间的人物，希腊人则包括各个不同时代和不同城市的菁英，虽然列传中人物的时代和地点完全相异，建立的事功在于创基开国、制定法律、扬威异域、克敌制胜、政坛雄辩或厉行改革等方面。

纯粹从史学的观点来看，普鲁塔克所写的传记很多地方不够确实，提出的数字和运用的资料，未必全然可信，有些情节的叙述，不免发生错误或出现矛盾。然而他对传记的写作有一个最大的目标，就是要确定这些传主的道德性质。特别是在对比的评述当中，他所采取的步骤是先论断他们的德行和操守，再衡量这些